

西方现代派作家对异化现象的表现与反抗

冯寿农

资本主义制度进入 20 世纪后工业化阶段后,人的劳动、宗教、精神、心理、经济、政治、社会引起全面异化,异化成为西方社会中的普遍现象,美国学者福伊尔·利希特说:“20 世纪的许多小说家都说成或者说成是描述异化、为异化痛惜的小说家。诺曼·梅勒于 1959 年写道,前八十年的美国文学是一种异化文学。一位法国评论家甚至作了更广泛的说明,‘异化几乎席卷了整个的现代文学’。”^①异化成为 20 世纪外国文学中最重大的主题之一。本世纪的作家痛切地感知到、认识到人的异化,他们在作品里着力表现这种异化感和现代人的自我异化的分裂人格,揭露造成人的异化的种种因素。揭露的目的在于唤醒人认识到异化,更在于以文学的形式反抗异化、克服异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 世纪的西方文学是反异化的文学。要界定反异化文学,必须弄清异化究竟是什么?异化自古就有,还是本世纪的现象?现代派文学究竟从哪些地方表现异化?又是如何反抗异化?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先弄清异化的涵义和概念,进而从异化的角度对 20 世纪西方文学进行总体的考察。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使用了

“异化”一词,把异化的概念作为一个中心范畴来阐明,将它应用于精神的演化(精神、道德),精神首先通过外化、对象化和异化,创造了世界(对象、实体),然后精神体验到它的自己的创造物和表现形式是异化的力量,最后通过认识(教育、文化)克服它的自我异化,这样便获得了精神真正的实在和统一。在黑格尔看来,异化就是把“自我”根本分裂为主动者和物,分裂为一个努力控制自己命运的主体和一个被别人操纵的客体。

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中指出,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感情的特征赋予一个外在的对象,而后创造了上帝,人象奴隶一样向之低头膜拜,实际上这是人在自我异化、自我崇拜。费尔巴哈认为,克服异化的方法便是人应把那些神圣的东西和感情复归回到人的身上,通过一种人道的宗教,通过一种自爱的宗教使他自己恢复完整。

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但是他强调人的宗教异化只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许多形式之一。人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异化为神的形式,而且还把自己其它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哲学、常识、道德等等的形式。人把自己的经济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的形式;人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异化为国家、法律、社会制度的形式。因此,人同自己活动的产物相异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异化具有强大的力量,人只是隶属于它的无能为力的奴隶。马克思异化理论的

起点是异化劳动问题。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势力同劳动相对立。”^②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私有制和阶级斗争一形成就伴随着异化现象的产生。卢梭及其许多信徒认为，自从人脱离其“原始”状态，异化就发轫了，私有制和文明是异化的根源。费尔巴哈却认为，异化是随着宗教的产生而开始。西方异化论历史观把人(人性)的异化说成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规律，把人类社会说成是一个与人的本性相敌对的异化的世界，把人类历史说成一部人(人性)的异化的历史。他们认为，各种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都是和人的本性相敌对的异化力量，它们支配人、压迫人、奴役人，使人丧失人的本质而异化成为“非人”。^③西方异化论历史观以偏概全，过分地扩大化，没有考虑不同的历史时期异化的强度不同。我认为，异化随着人类开始创造文化就存在，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文化是精神和物质创造的总和。在精神文化上，如图腾、宗教，人创造了神和上帝，人却受神的统治，人已经在自我异化；物质文明产生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人一进入奴隶社会，就被异化了。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文化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消极的是使人异化；积极的是使人“人化”(萨特语)。“人化”是使人摆脱野蛮和愚昧，使人更加完美、更加聪明。因此说，异化是自古而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却有不同时代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出现剩余价值和科学文明带来机械化和自动化，人异化达到了它的顶点。异化成了人的解放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制度下，这种异化过程在不断强化。20世纪西方人从宗教信仰过渡到政治信仰。^④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了，人们没有精神依托，都过分相信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度，这个民主制度演变成政治的反动，建立一个与人民相对立的、有全权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最后过渡到法西斯专政；另一方面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然而，法西斯强权政治却利用科技进步，发动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西方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意识到人在四处被异化。以前西方人还没有意识到异化的现象，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思想界里才意识到，一些哲学家作了系统的研究；但在文学界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异化问题，即使19世纪巴尔扎克在作品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从客观上揭露了人的异化，但作者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异化问题；而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伟大之处是作家强烈地感受到异化，并且自觉地从内心去表现异化感。异化感是一种人的自我分裂的痛苦的精神体验。异化成了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主题，异化感成了现代派文学风格的根源。现代派作家以非理性、变形和荒诞的手法表现现代人的种种异化现象，异化主题和异化感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表现为：“惶惑不知所措、忧虑焦急、社会的沉沦和个人的精神颓废、悲观绝望、丧失个性、没有根基、淡薄无情、社会失控、寂寞孤独、分化(atomization)、无能为力、没有意义、轻生厌世、丧失信仰或社会准则。”^⑤

二

即使西方有不少哲学家已论述过异化问题，但最系统、最透彻地论述这个问题的还是马克思，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异化现象作一次巡视。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著名的一节《异化劳动》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将人的异化区别为四种形式：人同自己的活动的产物异化，人同他的生产活动本身异化，人同他的人性本质异化，人同其他人

异化。换言之,就是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四个方面关系的异化。西方现代文学正是从这四个方面揭露人的异化。

首先是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20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使西方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科学技术也成为人类进步的异己力量,自动化机器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却增强了资本的增殖能力,强化了资本对于工人的统治能力,成为约束和排挤工人的有力手段,造就了一大批的失业大军。现代军备竞赛使各种武器竞相出现,使世界拥有的核武器达到150亿吨TNT当量,人制造了武器,却是要依靠武器威力的平衡来制约资本的战争欲望;人们把科学从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今天却往往使它成为资本的婢女和奴仆。爱因斯坦曾担忧原子能不仅能造福于人类而且还可以毁灭人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推动下,现代工业蓬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土地沙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现代医学和物质生产能力,虽然提供了人们生存和健康的保证,却使人口激增而超过地球的负载能力,各种工业社会的奇病怪症,使人们的健康受到新的困扰。恩格斯早就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⑥

许多现代派作家在作品中抗议科学“进步”的反人类性质,抗议科学把人视为自己俎上肉的做法,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库尔特·冯尼古特的科幻小说最直接地表露出这种抗议。《万有引力之虹》对后工业化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表现出一种怀疑和担忧,认为科学在军事上的滥用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冯尼古特描写了科学一旦发明了人类智能平均器后给生活带来的可悲又可笑的后果。这些作家对整个科学进步造成的普遍性的后果表示悲观。劳伦斯便认为科学进步造成的机械文明使人丧失人性,使人丧失自豪

而美丽的天性。福克纳对现代机械文明破坏了南方传统道德中的美好成分表现出无限怅惘。因此,在当代机械文明面前,人丧失自由感、主体感、崇高感和幸福感便成了现代派文学常谈的内容。荒诞派戏剧家尤奈斯库的《椅子》、《未来在鸡蛋里》和品钦的《送菜升降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直接表现人在科学和物质文明中的异化状态。人成为非人,人的存在化为虚无,表现了现代作家对过分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带来的进步产生怀疑和悲观的心态。

其次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人要受社会的束缚,人变成无灵魂的零件。现代派作家们大多看到了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因素,他们用隐喻的形式表现这个主题。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便是对这一异化因素的最初剖析。《审判》中的K的灾难是由于整个外部世界(包括国家机器和法律)丧失了人性,成了人的异己力量,法官和法律不过是这种无法接近和无法了解的象征而已。《城堡》中那座象一只巨兽一样冷漠地、威严地高踞于山岗上的城堡,可以说是一部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机器的象征。城堡(统治机构)本来是人建立的,现在它与人之间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成了一种超现实的统治力量。在这些作品里,社会是一个强大而无形的机器,它左右着甚至玩弄着个人的命运,个人在它的作弄下,就象一只被猫戏弄的老鼠,象一只软弱无能的虫。艾珉指出:“资产阶级愈是接近它的全面胜利,资本主义秩序愈是巩固,人们感到距离‘人’的理想愈遥远,‘人’愈来愈失去自己的本质,变成了物的奴隶、机器的附属品。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19世纪前期,在斯丹达尔、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

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19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19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愈走向世纪末,人的形象愈委琐、渺小。两次世界大战更将人们抛入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迷惘和惶恐之中。”^⑦在现代作家的笔下,涌现出一批“小人物”、“反英雄”,这都是些懦弱的人、无用的人、失败者、迷惘者、彷徨者,是一批无个性者、畸形儿、甚至疯子。加缪的《局外人》的主人公对周围的感情、见解、愿望全然不闻不问,冷漠处之,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处在资产阶级正规规则和框框之外,他说:“我,一个局外人,感到畏惧,在一个根本不是我创造的世界里。”^⑧莫迪阿诺在作品里都是塑造一些被社会抛弃、没有国籍、没有身份证的漂泊者。这些人无能力,感到人的命运不是由他自己所掌握,而是被外在的因素、被命运、被运气、或被某种莫名的支配所决定,他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世界是无法理解的,社会是荒诞不经的。

其三,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在物物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以人的关系出现,而是以物的关系出现。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产品不是因为另一个人是人、有人的需要,而是因为另一个人拥有物品,拥有等价物。如果一个人没有等价物,即使他有需要,别人也不会给他提供产品。在交换中人是作为物,作为私有制发生关系,而不是作为人在发生关系,人们进行交换不是为了满足彼此的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排斥对方对自己产品的占有。马克思的意思,人与人的关系异化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不存在情感的关系,只有利害关系、金钱关系。

萨特在他的境遇剧《间隔》中描写了三个灵魂扭曲的人物。剧中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可捉摸的变态心理折磨着每一个人,使他们一个个都变得凶狠、残忍。伊内直言不讳地说:“我活着就是要别人痛苦,我是一把

火,是烧在别人心里的一把火,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便熄灭了。”她把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其他两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刽子手”。萨特从而提出了“他人就是地狱”这一著名的存在主义格言。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思曼提出: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三次变化,即传统支配的、思想支配的和他人支配的。中世纪人的关系受传统支配,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关系受思想支配,而现代人的关系受他人支配。人们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而根据“对其他人的行动和愿望的特殊的敏感”,即完全根据与他人的利害关系调整自己的行为。英国当代作家戈尔丁的《蝇王》以寓言的形式,再现了人类从“传统支配”、“思想支配”到“受他人支配”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史。^⑨一群从文明世界来的儿童,因飞机失事困在荒岛上。他们曾受文明传统支配,友善相处。但渐渐地,思想分歧出现了,一派强调肉体满足,另一派强调灵魂得救。最后由于利害关系冲突,几乎变成了一场野蛮人的战争,恶终于战胜了善。

最后是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中,人与人本身异化了。人为了占有他人物品而生产,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物品的生产者,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自我异化就是自我分裂,至少分裂为彼此相违的两个部分,人本身变成对立矛盾的统一体。斯特林堡在《梦的戏剧》(1902)中说:“人物分裂了,变成了双重性、多重性的;他们蒸发、结晶、分散、聚合。”^⑩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现代心理学认为,自我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本能(欲望)和下意识,他揭示了人格或人性的内在矛盾。许多意识流作家,如乔伊斯、沃尔夫等都把笔触深入到变化多端、高深莫测的内心世界,想在挖掘潜意识中寻找自我。但大部分都以失败而告终。从“寻找自我”到自我消失,“人”异化为“非人”,这就是某些现代派作家在人与自

我关系上所得到的结论。艾里生的作品《隐身人》的主人公是一个无名无姓的黑人,他一心想弄清楚自我是什么,才好成为其人。但是,他无论走到哪里,总归是一个听从摆布的工具或畜牲。他越想寻找自我,越找不到自我。最后,他便躲进一间地下室,变成了一个谁也看不见的隐身人。由于人性的丧失,自我的分裂,“我究竟是谁?”这个本体论问题成为许多现代作家苦苦思索的问题。莫迪阿诺的《暗店街》(1978)的主人公是个健忘症患者,十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忘记了前半生的事,他决定去寻找前半生,弄清“我究竟是谁?”通过蛛丝马迹的查找,只能断断续续恢复部分记忆,象拼七巧板一样拼凑自己的前半生,最终仍然弄不清自己是谁。人的自我被社会一股熵的力量击成碎片,拾回来的碎片拼凑起来也只是残缺不全的人生。正如斯特林堡所说:“我的人物是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的文明的混合,是来自书报的碎片,华丽衣服的碎片,它们被拼凑到一起,构成了人的灵魂。”^⑩

三

20 世纪的文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中出现异化:宗教异化、哲学异化、政治异化、社会异化、经济异化等,西方人生存在一个全面异化的氛围之中。文学应该揭露异化、反对异化。福伊尔·利希特强调:“艺术是发挥人的创造性和本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如果不是唯一途径的话,它几乎象是治疗异化的药方,象是克服人的消极性和人性的丧失的妙药。……艺术正是异化及异化之无意义、无能为力和疏远感觉的对立物。此外,艺术是愉快的源泉,反之异化是悲哀和绝望的经常性原因。”^⑪马尔库塞说:“艺术,作为当在现实的异化,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⑫文学艺术对异化的批判,看起来

并不单纯表现为对异化劳动和异化社会的直接声讨,而是通过各种审美形式同异化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抗。马尔罗也说过:“历史使人认识命运,而艺术则使人摆脱命运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艺术本身就是对人类那种注定屈辱的命运的一种抗衡,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反命运”。^⑬文学创作是人类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现代派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摆脱屈辱的生存、摆脱人生来具有的生之荒诞性,克服无所不在的异化感。现代派文学通过异化的人、人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来表现垄断资本主义混乱颠倒的社会关系,他们作品的主人公以一个个局外人、流亡者、孤立无援的畸形人自居,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对这个社会深恶痛绝,向这个社会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包括宗教信仰、伦理观念、自由主义教育、商业文明、审美观和性道德等进行全面的攻击。他们的反抗主要表现在:

一、反理性。在某些异化的分析者看来,理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东西和替罪羊,“理性是文明生活中的异化力量”,“哪里理性与生活相会,哪里理性一定发生异化”。^⑭迈克尔·兰德曼甚至写了一本书来证明异化是理性和悟性的产物。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统治了四百年,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力量束缚着人的自由。现代派作家努力挣脱传统理性的框框,追求文学创作的自由,他们通过非理性的夸张的形式,将现实生活打碎,按主观意象组合夸大,将现实与梦幻、客观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使本来荒诞的东西更荒诞。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弃绝任何理性因素,追求他们所谓的“超现实”,即“绝对的真实”。本世纪初,随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许多学者认为,自我异化是意识和下意识的分裂,受压抑的东西埋在潜意识里,造成人格的分裂。因此,超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无意识的写作”,要努力表现潜意识的东西,使人性挣脱压抑,得到彻底的解放。弗洛伊德有句名言:“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⑮现代

派作家们欣赏这一观点,竭力去发掘和发现人的潜意识和下意识。于是他们大量运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把直觉与幻觉、记忆与印象、想象和幻想,甚至把梦境与现实全部糅合到一起。普鲁斯特、乔伊斯、沃尔夫、福克纳等“意识流”作家在情节和结构上打破传统的手法,以“意识流”为结构,不要求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丰富性和完整性,而以人物的意识作为描写的“银幕”,使情节结构从属于、服务于人物的意识流动;采用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交错这三大创作手法。詹姆斯说:这些作品是“思想之流”、“意识之流”、“主观生活之流”的集结物。

二、反道德。传统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束缚着人的自由,压抑着个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纪德为代表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中的一切失去信心,产生一种失望情绪,进而对一切都否认和渺视,希望了解自己的真正存在价值,了解真正的自我。纪德把现存社会中的一切看成是“德”,他的一切努力在于背离这种非人类自身具有的东西,于是背德主义便成为纪德一生为之努力的追求。背德主义就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反抗形式表示对占统治地位的虚伪道德的抗议。^⑩纪德在他的代表作《伪币制造者》(1925)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都在弄虚作假”,宗教在骗人,文坛在作假,道德象“伪币”一样四处流通,人人都被异化,变成“伪币制造者”,在这个虚假的世界中尔诈我虞,弱肉强食,人成了上帝的玩偶,成为骗子的受害者。纪德认为,克服异化,消除虚假,就要“自然”、“真诚”;人的本质是自由,要抛弃一切既存事物(直至书本知识和家庭)的束缚,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自我;无拘束地满足欲望和本能以充分享受各种形式的生活。西方学者曾做过民意测验,研究结果表明,青年人的异化主要根源于家庭结构之中。纪德在许多作品中叙述浪子离家出走,他有一句名言:“家庭,我恨你!”他在《人间的食粮》中

怂恿青年离家出奔,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满足感官和欲望的需要。获取最强烈的感受和最大的自由。

三、反分裂。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异化就是主体的分裂,自我异化就是自我疏远、自我分裂。但现代派作家却认为,尽管自我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不过事物之间完全是相互关联的,对立是可以统一的。象征主义诗人探索神秘的“关系世界”——即霍夫曼·斯塔尔所说的“关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诗人的角色是“万物的沉默的兄弟”,在他看来,世界不是各种类型、抽象概念和一般规律的堆砌,而是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只对他个人具有意义,他的思想就是其中心和协调者。因此,现代主义的目的是要确立或恢复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是要还我一个大写的人。诗人借助隐喻建立“关系世界”,正如雪莱曾说过:“隐喻表明事物之间从前未被理解的关系,并使人们持续不断地理解下去。”艾略特说:现代“诗人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把根本不同的经验合成一体;普通人的经验是混乱的,无规则,支离破碎的。……而在诗人的心中,这些经验却总是在形成着新的整体。”^⑪

弗洛伊德的《释梦》(1899)出版之后,梦立即被大量应用到文学创作上,梦在表面上的不一致和不连贯,却被认为是心灵传达最复杂、最微妙事物的一个令人赞叹的最简练、最优雅的方式。弗洛伊德的“矛盾心理”观念把爱与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融合在一个统一体之中。荣格的心理学运用了互变的概念,即“每一事物向其对立面转移”。超现实主义从梦中抄来的真实自然的细节和这些细节之间随意结合,表明了“内在”与“外在”、梦幻与现实能如此相互贯通。贝恩也这么认为:“今天的表现型则取得了矛盾心理的结合,亦即每一事物与其对立物的融合。”^⑫

四、行动和介入。现代派作家面对人的异化,人的存在状况,并非采取悲观逃避的态

度,马尔罗主张积极行动,萨特提倡介入生活,加缪热衷于反抗,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人生观。

马尔罗的作品中渗透着和贯穿着关于人的状况、人的命运的荒诞性以及人应该反抗这种荒诞性的哲理。他认为人不能忍受生存的荒诞和屈辱,要提高人的尊严。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荒诞”,“把人的屈辱状况化为尊严”呢?马尔罗的总的理想是,“要摆脱人的状况”,“变成上帝,同时又不失去人格”,或者说,人要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阿波罗式的人,即要表现出比“生存的荒诞”,比死亡更为强大的力量,其途径就是行动。^⑨因此,他提倡一种什么都敢干的精神,什么都可以孤注一掷的精神。马尔罗就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一大批大胆行动、不怕痛楚和流血、视死如归的人物。

关于行动这一主题,萨特在《自由之路》(1945—49)中描写一个虚度年华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逐渐意识到“行动”的意义和对社会负有的责任,终于参加战斗,以生命为代价肯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他在战争中写的剧本《苍蝇》(1943),借古讽今,号召人们摆脱灰心丧气、消除无为的思想、奋起反抗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强调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强调了在被奴役的情况下,你完全有权选择反抗的道路,如果不反抗,则意味着放弃自由。“自由选择,重在行动”,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他的自由观,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选择的自由”,在这里,“自由”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它们所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的思考。人不需要任何神示来指导他的行动,每个人应该自己选择行动,自己对自己负责。萨特认为异化是“把人这一实际存在物同他周围环境联合起来的那种单一内在关系的结果”。异化来源于自在的存在,人通过自为的存在,即是通过自由选择,可以克服异化。自由选择就

是介入行动,所谓“介入”,也就是“对世界承担责任”。萨特认为,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写作就是揭露必以改变现状为目的”,他强调文学作品应包含深刻的历史内容,关注威胁着人类的灾难,反映人们的焦虑和探索。^⑩他认为,异化并非一件坏事,“这种异化按照辩证规律为解放准备了条件,为人的实现人化准备了条件,在人的入化之中,自然界将在人与自然的高度共生中得到解放。”^⑪

注:

- ①⑤⑫ 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下),文化出版社,1936年。
-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 ④ La fin des certitudes, Magazine Littéraire, No. 312, juillet - août, Paris 1993.
- ⑥ 李海等编《现代西方社会分析》,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
- ⑦⑭ 艾珉著《法国文学理性批判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 ⑧⑬ 廖星桥著《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
- ⑨ 赵晓丽、屈长江著《反危机的文学》,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 ⑩⑪⑮⑯ (英)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 ⑰ 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 ⑱⑲ 柳鸣九、罗新璋编选《马尔罗研究》,漓江出版社,1984年。
- ⑳ 罗国祥著《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 ㉑ (美)伊·库兹韦尔著《结构主义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系)